



上海艺术沙龙丛书

中国当代版画名家实录

主编 龚云表

徐龙宝

上海书店出版社

徐龙宝

上海艺术沙龙丛书

中国当代版画名家实录

龚云表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版画名家实录·徐龙宝 / 龚云表主编.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5
(上海艺术沙龙丛书)
ISBN 7-80678-274-5

I. 中... II. 龚... III. 版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4419 号

策 划	张继平 葛千涛 李锡田
主 编	龚云表
责任编辑	李远涛
特约编辑	王 燕
技术编辑	张伟群
装帧设计	邢宇萍(特邀) 唐 泓 袁建敏

设计制作 上海御世图文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中国当代版画名家实录·徐龙宝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印 刷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x1194mm 1 / 20
印 张	4.0
出版日期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78-274-5/J.156
定 价	40.00



策 划

张继平
葛千涛
李锡田

主 编

龚云表

责任编辑

李远涛

特约编辑

王 燕

技术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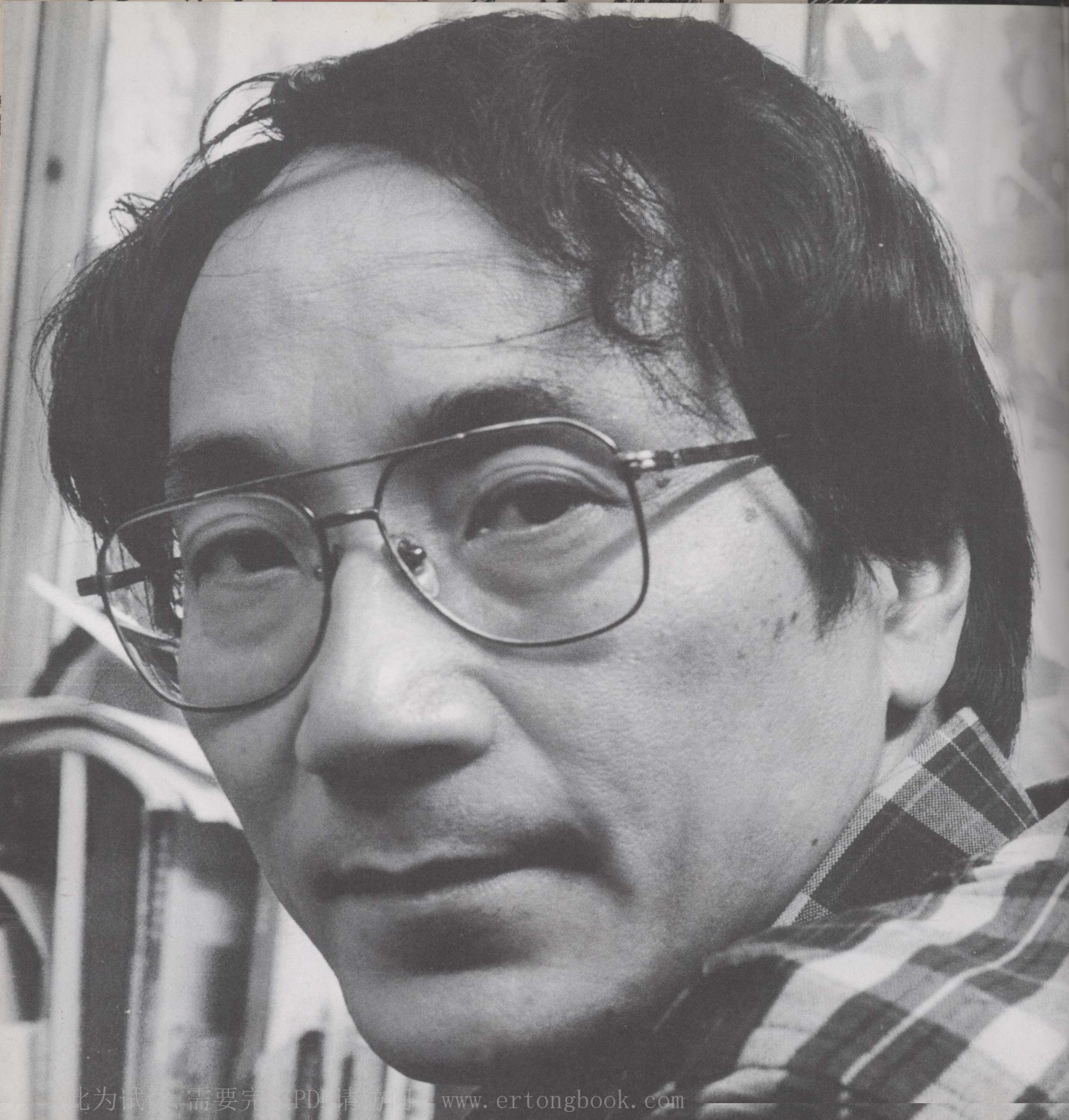
张伟群

邢宇萍(特邀)

装帧设计

唐 泓

袁建敏





徐龙宝

徐龙宝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版画工委副会长

总序

中国版画，是在具体的、特定的时间和历史中产生、发展和重新塑造的一个画种。中国版画曾经有过极其辉煌过去。但是，正如鲁迅在《〈木刻纪程〉小引》中所说：“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但现在的木刻，却和这历史不相干。”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国版画，从版画本体由传统的复制木刻到现代的创作版画的转换，再到当代版画的转变观念，拓宽艺术语汇，探索个性和风格的创新，关注现实生活和精神内涵，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创作版画的历史，如果从“新兴版画”运动算起，只有短短七十多年的历史，可算是一个最年轻的画种。它滥觞于战争频仍和民族危亡的动乱年代，因文学巨匠鲁迅的倡导而异军突起，发挥过一个画种所无法承受之重的特殊作用。但是，艺术的发展自有其固有的规律，版画也概莫能外。毋庸讳言，中国版画的现状已在相当程度上滞后于其他画种，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和理论上至今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特有的美学思想、价值取向和技法体系。堪可欣慰的是，一大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当代版画家，正甘愿肩负起显得过于沉重的艺术使命，殚精竭虑，默默耕耘，努力把中国版画推进到当代文化的序列中去，重铸中国版画的辉煌。这正是收入“中国当代版画名家实录”丛书的版画家的共同之处。

每一位卓有建树的中国当代版画家，他们的创作必然是基于对世界范围文化发展和当今中国大文化背景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深刻思考。版画作为一种载体，正可成为这种思考的物化呈现和表述方式。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创造热情和表现力，一种顽强不息的探索精神，但更重要的，无论是版画语言的创新，还是艺术范式的个性化，也无论是自我超越能力的提升，还是对当代审美的人文关怀，其最本质的，仍然是凸现出这种思考的深刻性和当代性。

这套丛书也许无法展现中国当代版画界创作的全貌，但或可提供一个视角，从一个侧面为人们呈现中国当代版画家们站在新的时代和历史的高度所作出的不同思考。如果由此能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共同营造一个有助于中国当代版画发展的当代性、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空间，则幸甚。

中国当代版画“纪程”，已走进新世纪，正指向未来。

编者

2004年4月

目 录

总序

自传

未完成的人生印痕·····	2
---------------	---

作品

花·····	14
花之二·····	15
毛泽东·····	16
孙中山·····	17
鲁迅·····	18
鲁迅书房·····	19
木刻讲习会址·····	20
井冈山·····	21
文昌阁·····	22
四川路桥·····	23
孕育 NO.1·····	24
孕育 NO.2·····	25
孕育 NO.3·····	26
孕育 NO.4·····	27
孕育 NO.5·····	28
孕育 NO.6·····	29
凝视·····	30
鹰·····	31

翔·····	32
兀立·····	33
瓶花·····	34
花球·····	35
夜色·····	36
月夜·····	37
寂静·····	38
鹭鹭·····	39
瑞雪·····	40
枝叶·····	41
雀尾·····	42
羽·····	43
蝴蝶花·····	44
嘉利树花·····	45
苹果花·····	46
书票 NO.1·····	47
书票 NO.2·····	47
书票 NO.3·····	48
书票 NO.4·····	49

谈艺录

对话：版画的当代品格与个人话语·····	52
----------------------	----

艺术年表

自 传

未完成的人生印痕

一 童年



1961年，全家福



1962年，兄妹五人和父亲，摄于虹口公园



1962年，在虹口公园爬树

老上海的北堍泥城桥（今西藏路桥）有一座闻名全国的仓库——四行仓库，在抗日战争中曾因八百壮士英雄守库抵抗日军而蜚声海外。从沿苏州河雄踞的四行仓库一直延伸到乌镇路桥，在大仓库之间有一大片不起眼的棚户简屋群，那似鱼刺状的房屋中有一幢较为显眼的简易石库门，黑漆大门上钉着“光复路161弄91号”的门牌。那就是我曾居住了整整三十年的家。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我度过了苦涩的童年和彷徨的青年时期。

1952年11月1日我出生在这幢石库门的客堂楼上，母亲生我时父亲不在身边，临时叫的接生婆，那时父亲离开祖父独自经营一个小手工作坊，带领几个工人加工铜管，收入很不稳定。母亲在家带着大哥和我，全家生活在14平方米客堂楼上，生活极其平淡。我出生7个月后就开始生病，因没钱医治不到1岁时左脚就不行了。人家的小孩1岁多就开始走路，而我长到好几岁也没有学会走路，跌跌撞撞，摇摇摆摆挣扎在人生的旅途。不久家里又有了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苦涩的童年生活还是充满着兄弟友情，没有今天孩子的孤傲和自私。

1958年“大跃进”，弄堂的墙壁上画满了壁画，内容尽是工业放卫星、农业大丰收和人人动手、消灭四害之类。家里的哥哥在上学读书，弟妹们进了里弄办的简易托儿所，只剩下我这个残疾儿童只能留在家中，孤独的我总是看着这些壁画发呆。

1959年，我刚过6岁，母亲看我在家里无事，便让我提早进入了民办小学（公办学校按规定要7足岁）。在国庆路民办小学里，破旧不堪的桌椅上我开始了学习生活，也许是从幼年时一直在贫民窟里，被文化教养不高的小孩戏弄，心里有气，因此学习时很用功。上午上课，中午自己到里弄食堂买饭吃，下午就到学习小组做作业。休息的时候，穿着木拖鞋，沿着弄堂的弹街路，常到弄堂口苏州河边玩。那时的河水还蛮清，常有河边的居民在洗衣服，水中还有小鱼。有一年夏天发大水，弄堂里全是水，成了孩子们嬉水的好时光，听说隔壁弄堂楼张家还抓到一

条大鱼。还有就是看连环画，弄堂口过街楼下面有个小书摊，四米长的墙上摆满了小人书，使我非常入迷。那时没有电视可看，我一有空就在小书摊上转，看连环画成了我童年最喜欢的事。

我对绘画发生兴趣，主要是受我哥哥的影响。大哥从小喜欢画画，读小学时就被老师推荐去少年宫学画。儿时记得他特别喜欢画马，我喜欢在他旁边看，为此额头上还留下一道永不消去的疤痕。那是一次我哥画了一个女孩漂亮的脸蛋，我乘他不在的时候，用铅笔在脸蛋上涂了很多麻点，这下可糟了，大哥一气之下推了我一把，我腿不好，一下子跌倒在墙角边的水缸壁上，顿时使我的右额皮破血流，为此母亲将我哥哥痛打了一顿。也许正是此时我的心头萌发我也要画画、并要和哥哥画得一样好的想法。然而此时的家境不可能为更多的孩子提供画画的物质条件，也没有图画书可以描摹。兄弟几人常常将春节吃的糖果纸收集起来，藏在书本里，甚至跑到离家不远的中百一店去看糖果上漂亮的图案，看到地上有好看的糖纸也会拾起来，如获至宝地仔细欣赏一番。

突如其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平时里只能吃一些“光荣菜”、南瓜、面疙瘩、菜饭，整天饥肠辘辘，使得少年时的我根本不敢有什么当画家的奢望，能写好字，能为学校里黑板报画点粉笔画就已经满足了。每天放学后，到弄堂口小书摊，挤在人家小孩旁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连环画故事，吸取一点绘画营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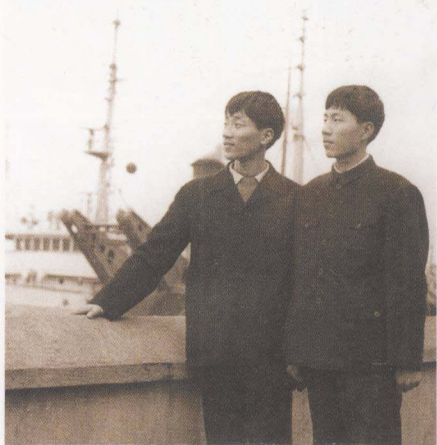
在念小学的六年，我得到过许多画画、写字的奖状，当过中队学习委员之类的班干部，在家中五个兄妹中算是成绩比较好的。1965年我小学毕业。秋天，我考进闸北九中。第二年初春，我的脚疾又犯，不能走路。父亲为我做了一个拐杖，我才能勉强支撑着上学，捣蛋的同学不时还抢走我的拐杖，我的初一还未读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校园里到处是红卫兵，“停课闹革命”，开不完的“批判会”。我心灵上一片迷茫，看到同学们在街上游行，上北京大串连，我只能呆在家里听听收音机，每天去弄堂口过街楼下报栏前去看报度日。更倒霉的事情又降临到我家：父亲被错划为资本家，母亲被诬为地主之女。记得一个盛夏夜，我躺在地板席子上睡着，父亲单位的造反派冲进了我家，搞所谓的扫“四旧”，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造反派在我家门前贴满了大字报，从此我家就成了邻居们的笑料，就连我这个残疾少年也成了心怀叵测的人写大字报的材料，榜上有名。那时的家境就如同黑云压城，我生性胆小，对“文革”运动充满了恐惧，至今心有余悸。



1973年，全家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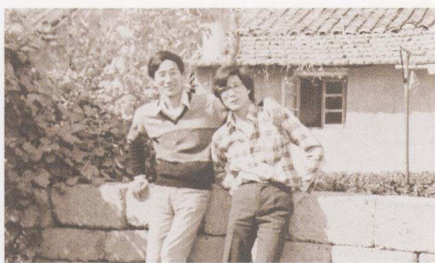
1972年，在161弄91号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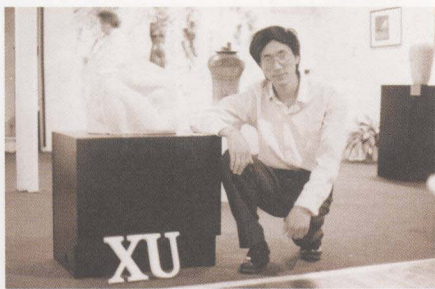
1972年，和龙华弟在外滩



1985年，在邮电新村家中



1987年，和龙森弟在梅陇土鳖堂画室前



1989年，在美国温泉城举办画展



1989年，在美国兄弟画展开幕式上

此刻我唯一的希望是看到哥哥了，他是我心目中最大的英雄。他那时在学校要到星期六才回家，到了家里他便会讲他去北京串连，见到毛主席……他给我捎来了哈定的《怎样画肖像》之类的美术专业教材。我如饥似渴地抄写教材、临摹书中的每一幅画。也是他，带我一起到工厂、部队去画毛主席像。我很快就掌握了技法，从一个助手变成能够独立绘制巨幅毛主席像的小画家。每次画毛主席像，总会得到一些奖励，除红宝书外，还会有余下的油画颜料等，使我学习油画有了物质基础。从1966年到1969年的三年，我在家里生活就是这样度过的。在这期间我还把大哥画过的画全部临摹了一遍，连大哥临写的赵孟頫帖我也一个字一个字地练。这三年多自修生活使我系统地学习了美术理论和画了大量的素描，邻居的孩子都成了我写生的模特儿，这三年我常自喻为“在家读美院附中”。

在那焚书坑儒的年代，我还偷偷看了很多所谓的“禁书”，只要能借到的书都看，其中鲁迅的作品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特别崇拜鲁迅的诗，全部都能背出来。那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几乎成了我的座右铭，正是此时我种下了鲁迅的情结。

二 社会大学

1970年，我18岁了，算是一个成人了。“老三届”一片红，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干革命的锣鼓声也过去了，我渴望自力、读书、谋生，但此时读书是不可能了，没有一所学校是开学的，工作也得由社会统一分配。那一年我终于有了进厂工作的机会。我被分配到了一家区属小厂，因为我会画画，总算有一技之长，所以进厂当学徒，做的却是到厂办公室搞宣传工作。天天搞宣传画栏、画宣传画、抄大字报、听报告、参加批判会。每当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须连夜写大红喜报，拉大字横幅，至今我还能写一手各种字体的美术字，而且有很强的速记能力。

1971年闸北区文化宫举办木刻学习班，鲁迅先生在上海倡导的“新兴木刻”在“文革”中也可谓最方便的革命批判武器。我喜欢鲁迅的文章、诗歌，也因此喜欢上了木刻，从此与版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的木刻学习班由一位喜欢写隶书且擅长拉二胡的曹元龙先生负责。他非常热心，请来了指导老师叶滋藩先生，他是我的第一位木刻老师。记得学习班有近20人，都是来自闸北的各工矿企业的业余美术作者。叶老师办班的思路很清晰，目标出作品，以创作促基础，边学边干，边下生活边构思。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到闸北的彭浦工厂区下生活，走遍

了东站（现新客站）、苏州河码头……在木刻学习班里，杨可扬、邵克萍、叶飞、孟光等著名版画家给我们年轻木刻初学者上课，重温当年鲁迅先生在上海举办木刻研习班情景，我把全部的业余时间投入到了木刻版画的学习之中。至今我还珍藏着我的第一幅木刻原版，是临摹前苏联木刻家索洛维赤克创作的高尔基肖像，那发黄坚硬的百年黄杨木上留下整齐的排线，镌刻的高尔基形象得到了老师的赞许和肯定，增强了我学习木刻的信心。1973年，在市美协主办的“上海美术作品展”中，终于展出了我的第一幅套色木刻作品《群策群力》，反映上海工人自力更生造出自卸32吨争气车。记得当时为了创作这幅作品到上海货车汽车厂体验生活，画速写，忙得不亦乐乎，在叶老师的亲自指导下，充满了创作的欲望。我的另一幅独立创作的套色木刻《车站早晨》在1974年参展后发表在《版画》画册第7辑上，连在新疆做医生的表哥在乌鲁木齐书店里也看到了我的作品。当时我的心情非常高兴，一个被里弄的小鬼看不起的残疾人竟然能够发表作品，而且在那么遥远的地方都知道了，久郁于胸的自卑感得到释放、宣泄，心里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文化宫的一批木刻作品为闸北的艺术创作争得了荣誉，以后我一直参加闸北的美术创作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石版画创作也在版画学习班里展开，在叶老师的指导下，借来了石版印刷机，并且把上海商务印刷厂铺地用的石版当作材料觅得，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每个学员都能独立完成了数幅石版画。在这期间，我又得到了一大批专业版画教师的指导。张嵩祖、王劭音、董连宝等先生先后来讲过课，特别是方道先生，他刚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也来协助叶滋藩先生带教，他年轻热情就像大哥哥一样关心我们这一批来自工厂第一线的业余工作者，至今记忆犹新。这一时期，我们还到浙江美院去参观考察，聆听赵延年先生的木刻讲座，观看洪世清先生的铜版画创作。当我摸着曹剑峰先生创作的铜版原版时深为浙美教师们的认真创作态度所折服。

在我的社会大学中，影响最深的一位老师是邵克萍先生。他对版画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对木刻青年的辅导可谓呕心沥血。他常到文化宫来批改我们的作业，看我脚不好，特地到我家里来辅导帮助我提高木刻水平。邵克萍老师还将他的木刻著作送给我，经常为我提供刻木刻的版材，真是令人终生难忘。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谊几十年来一直保持至今，每年春节我都要登门看望现近90高龄的先生，以报年轻时所受到的教育之恩。

几乎整个70年代，每周一天在文化宫的版画学习以及许多次的文化宫借调搞创作，我创作了一批版画作品参加了全国美展和市里的多次展览。1981年



1989年，赴昆明参观第七届全国美展（版画展区）



1989年，在美国温泉城教授绘画



1997年，和王劭音、张嵩祖教授拜访沈柔坚先生



1998年，参加上海小型版画精品展



1995年，在公平路寓室（徐立摄）



1998年，组织上海版画会参加上海艺博会时的留影



1998年，全家参观上海海上名家陶艺绘画展



1999年，和王劭音教授等参加青岛中国版画家精品展

被市美协吸收为会员，是年29岁。

在1970到1984年的14年工厂生活中，初期一直在厂部做些美术宣传之类的工作。由于工作认真，踏实肯干，从不计报酬，不分日夜地为厂里工作，很快便入了团，做了团总支书记。业余时间坚持画画，经常被上级单位、文化宫、市区科技协会借调搞橱窗美术设计，并时有版画作品在市里展出发表，为厂里赢得了荣誉。于是领导找我要靠拢党组织，经过四年多的考察和车间锻炼，新党员支部审批大会如期召开。会上个别党员对我这个出身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入党问题，用极“左”的观点过于挑剔非难，使我在大会上第一次流出了委屈的泪水。幸好大多数人认为应该要“重在表现”，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1976年7月我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当时年轻人的心目中，入党是人生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此时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做“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身为新党员，8月份我便带领几十名青年团员去我妹妹工作的长兴岛农场去“接受再教育”，搞所谓的“青工学农”。在农场里，割稻、采棉花，什么农活都得学、带头干。晚上睡在农场简易仓库，搭个铺，支个蚊帐，连洗衣服都需要跑到很远的小池塘里。正在大家干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农场广播台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声音，于是厂里通知提前结束所谓的“青工学农”生活。在这艰苦的条件下，我在农作之余，仍然坚持画速写，画农场小景、青年肖像，可谓农活不断，画笔不断。

“文革”结束，工厂里主要是抓生产，领导派我去生产模具的车间当主任。我从来没有做官的习性，只会和工人一起干，我学会了模具钳工，能自己做冷冲模具。我还学会了开小车床、平面磨床、牛头刨床。抽暇我还为加班加点的先进工人画像，以此鼓励先进。

在模具车间工作不到三年，又因工作需要被调到厂生产计划调度科干总调度员。当时生产的是电话自动交换机，有2万个零件，忙得我几乎成了救火大队长。白天几乎不能画画，文化宫的每周一天的美术活动也去不了，当时的市文化宫美术负责人方向明和后任的武国强先生仍然很关心我，一直鼓励我继续木刻创作。好在再忙，到外地的机会还有。久居上海，去外地看看，作为一个画人是非常需要的，看看、走走，以丰富自己的创作阅历。记得有一次去河南新乡搞产品展销，我便搭乘厂里装产品的卡车从上海出发，一路上风尘仆仆经过靖江、商丘、开封、郑州等地。车开到哪里，我画速写画到哪里。以后我还到过北京、天津、沈阳、长沙、重庆、成都……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对我的版画创作很有帮助。

1977年我作为厂里的积极分子赴北京去瞻仰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遗容，当时北京天安门长安街不时有骡子拉车经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81年我的作品在“全国邮电美展”获奖，我去北京领奖，住在北京邮电部招待所，每天还要吃窝窝头，心里真不是滋味。

我在1981年结婚，次年生下一女，仍蜗居在母亲家。

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人们普遍重视知识，新的大学生陆续分配进我厂，点燃了我求学的愿望。领导将我调到负责企业管理的办公室，相对说时间比较宽裕了。想读大学，考虑到高考对身体条件的限制，然而这不能阻止我读书的欲望。经过两年的努力，苦读大学，终于取得了上海最高学府复旦大学的大专文凭。我之所以选择复旦是因为复旦校长谢希德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她的精神鼓舞了我的学习。

十四年的工厂生活，是我个人生活中最年轻最有活力的阶段，我将其视为我的社会大学，它培养了我一种诚实的信念和刻苦、耐劳、钻研的精神。这是我在社会大学学到的精髓，也是我终身受益的支柱。我的整个青年时期在社会最底层中度过，得到许多人的关心和照顾。主管生产的厂长李志寿十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的成长，他那永远年轻的精神，任劳任怨、忘我工作的态度一直激励着我，至今难忘。

三 工大十年

1985年1月，我有幸调进上海工业大学，成为一名专职美术设计师。时任工大校长的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对我们年轻人寄予厚望，为我和同事们的画展剪彩，鼓励我们开设美术课，让工科学生学习艺术课程。1986年我和三弟徐龙华双双调入工大土木工程系给学生上素描色彩课，学校还批准成立了建筑美术研究室，支持我们为全校学生开设第二课堂的艺术教学。就这样，我从一名工人美术工作者成了一位大学专职美术老师，开始了执教生涯。我非常感谢钱校长，他的不拘一格降人材的用人思想和提倡艺术与科学结合的教学理念，是具有超前意识的。钱校长请来世界著名学者李政道、美国加州伯克勒大学杨振宁博士，和著名学者费孝通……为工大老师做讲座。使我开拓了视野，开始明白大学生活的真谛。

在大学执教的头三年，我抽空完成了专业的本科课程学习，取得了大学本



1999年，个展在东海堂画廊展出



1999年，同学钟燕群、金宝根来个展指导



1999年，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创作巨幅木刻画。此图为在家中刻版



1999年，个人作品捐赠仪式



1999年，访问韩国



1999年，在韩国大庆大学艺术交流会上



2000年4月，我的第一位木刻老师叶滋藩先生来参观东海堂画廊



2000年，兄妹五人相聚在东海堂画廊

科学历（现华东师大）。在这期间我常到龙森弟梅陇的“土鳖堂画室”，协助他一起搞雕塑。一天，我和森弟骑自行车从光复路家中出发，到华东化工学院附近，在画室的门口拐弯时，森弟不慎被东风大卡车撞了。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作为哥哥的我为此一直深为自责，恨不得撞的不是他而是我。森弟在市八医院躺了一个半月，脑里的血肿一直未消，然而凭他少年时练过形意拳的功底竟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古人语“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如今他开设东海堂画廊，成了上海滩最著名的画廊经纪人。

1989年我的版画《花》在全国第七届美术作品展中获银质奖（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银质奖牌上面刻着我的姓名），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这是我的艺术人生第一个辉煌的时刻。好事接二连三，其后不久，我与三弟龙华一道又应邀赴美国办展、考察。第一次走出国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但我也深深意识到，我的根在中国。所以在三个月后，我谢绝挽留毅然回到上海。不久，我又获得了“第三届全国藏书票艺术展”银奖，被学校评为工大优秀青年教师并提升为讲师。中国美协还批准我为会员，是年37岁。

我一直以为做一名教师是不容易的。如果要真心热爱学生，必须以教学为主，创作只能放在第二位了，尤其是在工科院校教学生画画。所以我在工大期间，从筹备专业教室，添置教学道具，到准备教案、示范稿，事必躬亲，从而赢得了学生的信任。

在工大的十年中，我参加了五届“版画藏书票全国艺术展”。对藏书票的钟爱源于早年对中国篆刻艺术的喜欢。我曾先后刻过几百方图章，在我看来，藏书票与图章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中西方不同文化的人对微型艺术品的共同关注，同样都在画面中浓缩文化的品位。中国篆刻从皇帝用的玉玺，到文人墨客用的闲章，与西方藏书票中显贵族徽、图书标识，无不浸透着东西方各自文化的传统。从毕加索、蒙德里安到中国的版画家李桦、张英伟都关注着版画藏书票。随着国门大开，书票艺术开始引入中国，这也是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为此我在业余时间，刀耕不断，努力将藏书票这一更能体现个性的艺术融入我国，如同当年将西方油画植入中国一样，为此，我对藏书票倾注了极大的精力而乐此不疲。

在工大的十年间，我以做一名合格称职的高校教师为己任。1995年，我担任建筑美术教研室主任。在工大和科大、上大、科专合并为新上海大学，成立建工学院后，我又任建筑系副主任。为上好建筑表现技法课程，在当时的院长即傅作义将军的女儿、留日博士傅克诚教授的指导下，画了许多建筑表

现画。但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我仍醉心于版画创作。在龙森弟的影响下，我开始了花卉木刻系列的创作、探索，具有中国画韵味的花卉系列木刻作品，在朵云轩展出。同时在套色木刻方面也试图摆脱过去的表现模式，吸收西方构成样式作品参加了1992年和1994年的两届“上海海平线绘画雕塑联展”。另外在版画藏书票领域，坚持强调拓印技法来表现中国文化，曾在1996年获得“全国第六届藏书票艺术展”金奖。

四 上大十年

岁月匆匆，人生苦短，我在上大不觉又度过了十载春秋。1996年，我被推选为上海版画会秘书长。1999年春节在龙森弟的资助下，我在东海堂画廊举办了版画、藏书票个展。编印出版了《徐龙宝版画作品选》。开展那天，版画界前辈和同仁们欢聚一堂，面对许多曾经为教导我而付出巨大心血的老师，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更难忘的是在上世纪末，赴青岛出席为中国版画事业作出贡献的中青年版画家大会，我荣幸地获得80—90年代“全国鲁迅版画奖”。回顾这十年，既有耕耘的艰辛，也有丰收的喜悦。我开始感悟版画的真谛，在版画创作中有了长足的建树，也总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可以安居乐业的家，还有一个15平方米的画室，可以静心搞自己的创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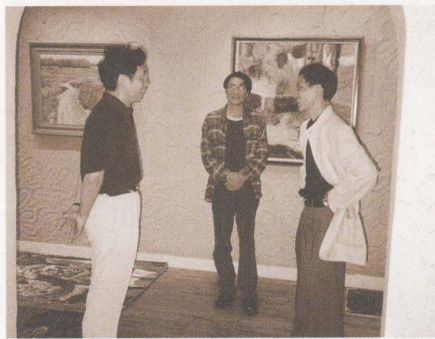
1999年，我随上海大学艺术交流团访问了韩国，与大庆大学师生进行艺术交流，我的版画作品还参加了《中韩大学作品交流展》。

同年，我应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之邀，为新改建的鲁迅纪念馆作大幅木刻《故事新编》。从草图到送审到作品的刻制，忙了整整两个月，一个暑假的时间全部都扑在鲁迅木刻创作上了。当新馆开馆的时候，看到了馆内唯一的一幅反映鲁迅题材的木刻作品是我的作品，心中真是百感交集。对鲁迅先生提倡新兴木刻的巨大历史功绩，我一直充满着敬仰之情，能为鲁迅纪念馆做点小小贡献也是鲁迅精神培育的结果。

在弘扬鲁迅木刻精神的思想指导下，在原上海版画会长、著名版画家杨可扬会长和新任版画会长王劭音教授领导下，我与卢治平一起为推动上海的版画事业，尽自己所能，做了一些事。2000年在热心版画的韩碧池先生的帮助下，我策划了《上海版画十五家作品集》的出版，多次到上海书画出版社亲自审样、看稿并撰写后记，填补了上海几十年来没有出过一本有一定规模的上海版



2000年，在家中画室工作



2000年，美术学院党委书记薛志良参观东海堂画廊（李建中摄）



2002年，为上师大美院授木刻课时与全班同学合影。后排左四为周培德副院长